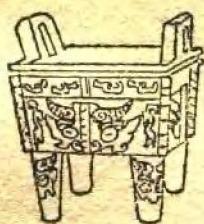


中華文史論叢

第五十二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責任編輯

谷 玉

中華文史論叢

第五十二輯

錢伯城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竟成印刷廠印刷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1664-4

Z · 247 定價：4.50 元

目 錄

[李鴻章與近代中國]

- 李鴻章論 楊國強(3)
李鴻章與洋務運動 戚其章(23)
近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變化與李鴻章的
海防戰略 楊天宏(36)
論李鴻章的“洋教”觀 董叢林(61)
同治年間江蘇省的賦稅改革與李鴻章
..... [日]白井佐知子(85)
論馬關議和期間中日全權大臣的交涉術
及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張富強(111)
李鴻章在培養和選拔人才上的革新與
務實精神 尹福庭(133)
李鴻章與曾國藩的特殊關係 賈熟村(154)
關於李鴻章文稿的發掘與整理 劉申寧(168)

[敦煌文獻考釋]

- 俄藏敦煌《玉篇》殘卷考釋 李偉國(183)

[古詩新證]

- 中古七言詩體的發展與佛偈翻譯 陳允吉(201)
唐彥謙四十首贗詩證偽 王兆鵬(226)

[旅游文化]

- 中國古代旅游文化民族特色考 范能船(245)

[讀書札記]

- 讀韓札記 錢伯城(261)

李鴻章與近代中國

[編者按] 1840 年列強的堅船利炮打破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無數中華民族的有識之士得以正視自己積貧積弱的祖國，他們艱難地、痛苦地、然而又是不間斷地努力尋求富國強民之路。李鴻章即是其中一員，他的選擇是辦洋務救國。

李鴻章 1823 年（道光三年）生于安徽合肥，卒于 1901 年（光緒二十七年）。他的一生經歷了道、咸、同、光四朝，數次沉浮而成為朝廷重臣，參與朝政達半個世紀之久。他的勢力控制了大半個中國，權傾一時。在他從政數十年的生涯中，他參與了中國近代史上許多重要事件：辦團練，鎮壓太平軍起義；興洋務，創辦江南制造總局、北洋水師；搞外交，調處大、小教案，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等等。故而梁啟超說：讀中國近世史者，不得不口李鴻章，而讀李鴻章傳者，亦不得不手中國近世史。李鴻章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其中的功過是非，在李鴻章有生之年，就已毀譽有加，身後更是一片貶

責之聲。事過一百多年的今日，後人自可盡興予以評說。
相信歷史當有公論。

現值李鴻章誕辰一百七十周年，偉大的中國正邁着
沉重的腳步進入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代，
回顧近代中國走過的道路，鑒往知來，我們特組織發表了這一組專題論文，以期引起理論界對李鴻章的重視與討論。

李鴻章論

楊國強

—

李鴻章由內戰露身手，以軍功得高官。但他后半生中最自負的卻是洋務。這種自負常因事發抒，以獨步一時的意態睨視天下。光緒初年，他在一封信中調教劉秉璋說：

至謂鄙人喜聞談洋務之言以致冒險負謗，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人人怡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即鹵莽，鮮不誤國。公等可不喜談，鄙人若亦不談，天下賴何術以支持耶？中國日弱，外人日驕，此豈一人一事之咎。過此以往，能自強者盡可自立；若不自強則事不可知。足下三太息，可惜不甚切題耳。^①

在晚清的疆吏中，劉秉璋並不是一個等閑之輩，但以洋務作論題，則李鴻章的話頭和口氣正像是在爲他發蒙。由文字見神態，其負手向天的傲岸和憂世憂時的心懷都是非常明顯的。

被今天的歷史學家稱作洋務運動的那個漫長過程，當時的

人們是用自強一詞來立名和釋義的。以自強名洋務，寄托着他們“虛心忍辱”，“取外人之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②的一腔苦心。西方人用利器逼出了中國人的自強；西方人的利器同時也為中國人的自強提供了一種物化了的尺度。因此，自洋務運動發軔之初，主持自强新政的人物就紛紛把目力鶻集于器物，急切地以實事、實利、實功來比照西方人手中的尺度。同治九年，李鴻章致書曾國藩論洋務，發心“苦做下學功夫，做到那處，說到那處”，并四顧天下，慨然有擔當世運之想：“吾師弟在位一日，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③20年之後，他在歲月的研磨中于洋務一道已經久嘗甘苦，感慨繫之，而檢點往事，則期期然自信“生平不解空言高論，只知以實心辦實事”。^④勘對19世紀後期的中國歷史，他所說的并不是大話。《清史稿》為李鴻章立傳，枚舉其“設廣方言館、機器制造局、輪船招商局；開磁州、開平煤鐵礦；廣建鐵路、電線及織布局、醫學堂；購鐵甲兵艦；築大沽、旅順、威海船鷗臺壘；遴武弁送德國學水陸軍械技藝；籌通商日本，派員往駐；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然後贊嘆說：“凡所營造，皆前此所未有也。”^⑤在這些“前此所未有”的“營造”中，既有着他的心血，也有着他的心願。其數量和規模都是沒有人能夠比擬的。環視前後左右，在那個時候受自强新政召聚而匯為一類的人物中，李鴻章無疑更沉鬱地自覺于實事、實利、實功。他因之而成爲這個群體中的最顯目者。這種地位，後來的歷史敘述多半名之為“洋務運動的中心人物”。

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中心人物，然而他始終未能成爲洋務運動的精神領袖。年輩在他之前的曾國藩，一生匯融漢宋，以富有個人體驗和學理深度的經世之學換來過衆多士人的服膺。年

輩在他之後的張之洞，則善用智術和智慧作折衷新舊之論。他以中體西用爲底本鋪敘出來的大篇文字兼備詞章與義理，極合章法地表達了洋務人物取新衛舊的共有心影，并在形而上的層次上感染了更多留心世務、關注國運的人們。中體西用一語，也竊竊乎成爲張之洞的專利。與他們相比，李鴻章顯然是略輸文采。他匱于學植，所以他沒有理論。雖說李鴻章起家翰林，在清秘堂裏泡過一陣，但還沒有等到他摸熟門徑，就已被召去帶兵了。後來的生涯中，他見長的一手是“才大心細，勁氣內斂”，^⑥然而義理、詞章、考據等等，則從此漸成陌路。因此，當他需要說理的時候，往往無法把不成片段的新知與“理氣”、“道器”、“體用”、“本末”之類粘連成一個理路圓融的東西。于是，他的洋務議論便祇能赤裸裸地以利害來動人心了。以利害動人心本是洋務運動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斷斷乎言利言害，顯出來的又是一種短視和短氣。自中西交衝以來，李鴻章比別人更透徹地識得利害，也比別人更專注地宣述利害。前一面表現了他見事之敏，後一面卻常使他看不到其他許多應有的東西。光緒十四年，御史余聯沅以鐵路爲題目彈劾李鴻章說：“是洋人以利啗李鴻章，而李鴻章以利誤國家也。”^⑦前一句話是不實之詞，後一句話卻超出了以鐵路爲本題的論爭範圍，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士大夫中的多數人對李鴻章慣以利害論事斷理的嫌惡。在他們深深的嫌惡裏既包含着守舊的頑固，也包含着功利所不能淹没的價值思考。後起的梁啓超遠不是一個同情頑固的人，但他爲李鴻章作傳，則直叙其“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并概括而言之曰：“不學無術”，是“其所短也”。^⑧以利害爲眼光，看出來的東西總是捉襟見肘的。當“兵事”、“外

交”、“朝廷”被視為天下大利大害之所在的時候，“民政”、“內治”、“國民”就成為目力照顧不到的地方了。他用“不學無術”四字把李鴻章的眼光與學問聯在一起，富有深度地畫出了一種沒有理論的功利主義。雖說梁啟超所代表的歷史時序比李鴻章更“新”，但他說出來的這些話中未必沒有當日言路中的人們願意引為同調的內容。不同的是，梁啟超的評說更多地流露了惋惜，而言路君子則更多地表現了隔膜和鄙薄。兩者的區別，畢竟又折射了新與舊之間的界限。

李鴻章與清議纏磨牴牾半生，常常從清議中看到自己被塑造出來的委瑣形象。由此激生出來的憤懣不平，成為他言談中的一個多見話題。然而瞻前顧後，其心頭又並非全然沒有自慚形穢的感覺。他晚年曾以曾國藩為比，敘述過一種不無蒼涼的心境：

我老師道德功業，固不待言，即文章學問，亦自卓絕一世；然讀書寫字，至老不倦。我卻愧一分傳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矯之氣，任意胡弄，其實沒有根底。現在真實學問，已用功不進，祇好看看《通鑑》，稍知古人成敗之迹，與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證，藉以鏡其得失，亦尚覺有點意趣。^⑨

這些話以深刻自責之辭表達了閱歷之後的內省，也表達了莫可言述的沉重惆悵。由此形成的，是一個解不開來的心結。時人記敘說：“公（李鴻章）最喜衡文，前充總理衙門大臣，適同文館學生年終考試。中文一場，試卷多于束筭，各大臣請公校閱，公喜甚，扃門三日，親手點定甲乙，其勤于衡鑒如此。”在這裏，“喜甚”二字表現出來的其實是受寵若驚，而“扃門三日，親手點定甲乙”則寫照了精神重負下的戰戰兢兢。受寵若驚和戰戰兢兢，都反映了

因中氣不足而產生的過度熱切和傾慕。還有一個故事更見痴心。光緒二十三年夏，李鴻章去見瞿鴻機，相托說：“聞今科北闈鄉試主考已經內定，我與君均在選中。但我數十年戎馬奔馳，久荒筆墨，不知能勝任否。君年優學富，久掌文衡，確係科場熟手。屆時務祈主持一切，格外偏勞。”後來知道，這個消息出自“不知何人”的“憑空結撰”。^⑩但由李鴻章的語言神態現出來的一副臉相卻使人印象非常深刻。因此，梁啟超不無困惑地說：“以蓋代勛名，而戀戀于此物，可見科舉之毒入人深矣。”^⑪他困惑于李鴻章眼界之淺。其實，李鴻章並不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他對八股取士之“絲毫無與時務”早就看得明明白白，并在奏議中直白地非議過：“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主張“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⑫在當日的中國，這些意見都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了對於科舉制度的不敬。然而“衡文”一事又常常牽動他心頭久有的隱痛，使他無法忘記自己的“蓋代勛名”抵不上士大夫眼中以宗師而稱大人先生者。他忿忿地說過：“現在這些大人先生，簡直都是秕糠，我一掃而空之。”^⑬以“秕糠”比大人先生，表現了極度的蔑視，但“我一掃而空之”的以己比彼，又用一種奇特的句式顯露了想做一個大人先生的強烈願望。這種化解不開的心結，使一個從心底裏鄙夷時文帖括的人非常矛盾地“戀戀于此物”，希望能從中借取一點領袖群倫的斯文和權威。當他延頸企足望着“北闈鄉試主考”那把椅子的時候，彷彿人也一下子變得短小了許多，其神情既使人可笑，也使人可哀。

然而，與同一個時代裏廟堂內外的大人先生相比，李鴻章自有另外一類聲望：“國家舊制，相權在樞府。鴻章與國藩爲相，皆總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繫望，聲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爲

重。”^⑭這種聲望並不來自清議的推崇，而是來自力負“防海交鄰”之重，“無論若何大難皆挺然以一身當之”的血性和強毅。血性和強毅，使李鴻章在身後獲得了“不避勞苦，不畏謗言”^⑮的追思，但在生前卻常使他孤獨地直面困窘，為天下承當難事。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的兵火由朝鮮漫延到遼東。以主戰得時名的翁同龢銜西太后之命急急赴天津詣李鴻章問策：

同龢見鴻章，即詢北洋兵艦。鴻章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徐掉頭曰：“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時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同龢曰：“計臣以撙節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鴻章曰：“政府疑我跋扈，臺諫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同龢語塞，歸乃不敢言戰。^⑯

“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刻畫了一種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憤恨。其中包含着兩重思之傷心的內容：一、“初，鴻章辦海防，政府歲給四百萬。其後不能照撥，而戶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購船械。鴻章雖屢言，而事權不屬，蓋終不能竟厥功焉”。^⑰“其後不能照撥”，是被西太后挪去造頤和園了；而戶部“奏立限制，不令購船械”，則出自翁同龢的裁抑。在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之後，李鴻章以 20 年慘淡經營換來國耻、罵名，扼腕沉思之際，不會不想到這些往事。他後來說：“過出于難言而人不諒，此中苦況，將向何處宣說？”^⑱在那個時候，這是一個沒有人能夠回答的問題。二、“倭事初起，廷議決欲一戰，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⑲由這種“水火之不相入”牽曳出來的意氣和情緒曾浸沒了其他許多東西。“戰”與“和”各有理由，然而兩者之間又隔着一層不能溝通的厚膜：“至是，中興諸臣及湘淮軍名將皆老死，鮮有存

者。鴻章深知將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應用，方設謀解紛難，而國人以爲北洋海軍信可恃，爭起言戰。”^②李鴻章盤算的是物力，所以想在戰爭之外別求途徑；“廷議”和“國人”伸張的是義憤，所以想用戰爭一展撻伐。義憤具有打動人心的感染力，然而最後裁斷勝負的還是物力。這個道理主持廷議的人們不久之後都明白了，而韓事引發的戰火也已經燒紅了中國的半邊天空。因此，李鴻章事後追論，猶有餘憾：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實能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裱糊，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下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③

他說出來的是一種不能動聽的低調。但在整個中日戰爭期間，他又“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④，比言戰的人們更直接地擔當着成敗勝負的沉重責任。身在北洋幕府的吳汝綸敘述當時情景說：“平壤之敗，李相痛哭流涕，徹夜不寐；此肯堂^⑤所親見，某親詢之者。及旅順失守，憤不欲生。”^⑥他心中的敵愾之氣應當不會比“廷議”和“國人”更少。當戰爭最終把中國拖入“不可收拾”之局的時候，因連戰連敗而灰頭土臉的李鴻章又被同一群人組成的“廷議”召去，在催逼推挽之下滿目淒涼地乘槎東渡，向戰勝的日本覲面求和。于是而有創巨痛深的《馬關條約》。

李鴻章練兵多年而一潰再潰，在當時的輿論和後來的評說中都不是無可指責的。但當和戰嬗遞之際，他卻以自己的行事表

現出一種主持“廷議”的人們所沒有的血性。《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收錄過非常傳神的一幕：“鴻章請同龢同往議和。同龢曰：‘若余曾辦過洋務，此行正不辭。今以生手辦重事，胡可哉？’鴻章曰：‘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孫毓汶徐用儀則以不割地恐難成局。諸人相對默默。”^②這些人個個都知道：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難事，又是污名。但面對“日人方圖遠略，舉傾國之師，逼我和款，所索既奢，且不願遽和”^③的局面，卻沒有一個人願為天下作計，分擔難事和污名。“諸人相對默默”正寫出了當初一腔義憤與如今一腔和心的對比。若以這些人作為反襯的景觀，李鴻章白髮遠行的零丁身形確乎顯出了挺拔和強毅。他在日本期間曾受刺中槍，子彈入顴頰，“血灑袍服殆遍”。衆醫以“割創取子”為請，被李鴻章拒絕。因為從他住處的窗口裏，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正在出征的日本船隊。他自述兩相權衡之後的心情說：“國步艱難，和局之成，刻不容緩，予焉能延宕以誤國乎？死生有命，我寧死無割。”^④但當他形神俱疲地帶着《馬關條約》回國的時候，等待着他的正是預料中的一片唾罵。一個京官上奏說：“今道路傳言，云有見李鴻章者，談笑自若，依然故態，面上並無一點傷痕。然則非真中槍也，恐人議與倭通，故假捏之耳。”^⑤人心之難以相通，竟一至于此。李鴻章在唾罵中作過一個奏摺，備極沉痛：

敵焰方張，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區，如虎傅翼，後患將不可知。臣昏耄，實無能為。深盼皇上振勵于上，內外臣工齊心協力，及早變法求才，自強克敵，天下幸甚。^⑥

數年後，康有為過馬關，記曰：“九月二十四日夜至馬關，泊船二日，即李相國立約遇刺地也。有指相國駐節處者，傷懷久

之。”在時光淘洗之後返視歷史，真相常常容易看得更清楚一點。他留下一首詩，其中兩句是：“有人遙指旌旗處，千古傷心過馬關。”^③

二

李鴻章是一個洋務派，但他對後起的維新派常常流露出一種非常明顯的同情。描述這種同情，有時候會使歷史人物本來的複雜多態溢出歷史分類後來為他們設定的界域。

就近代中國新陳代謝的此起彼落而言，蘊積已久的維新思潮是在中日戰爭之後走向社會的。“乙未二三月間，和議將定。時適會試之年，各省舉人集于北京者以萬數千計。康有為創議上書拒之，梁啟超乃日夜奔走號召，連署上書論國事”。^④方和約初定之際，李鴻章的名字是與和約同義的。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對李鴻章有着一種深深的異己感。當維新思潮一路騰越，滔滔然成大波，并在戊戌年間的百日新政裏登上巔峰的時候，李鴻章多半閑居在賢良寺裏，寂寞地看着新一代人物的紛紛出場。他曾經向強學會捐款二千兩，并請入會，但立即就遭到新黨們的回絕。顯然，他們認為李鴻章不是一個夠資格的人。

然而百日維新終究是一種沒有根基的東西。因此，當西太后反手一掌打來的時候，它很快就被捺入了血泊。在六君子斷頭于菜市口之後，新黨中的名人便一個接着一個成了緹騎追捕的逃犯。當此血淚交迸之時，被強學會接納過的大人物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都漠漠然看着西太后以辣手再造乾坤，并無一人敢以口舌爭是非。而能夠出來為新黨講公道話的，卻正是久為新黨

所不齒的李鴻章。西太后重新訓政後，有過一次“召對”，其間的君臣問答都極富個性：

太后以彈章示之曰：“有人讒爾為康黨。”合肥曰：“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太后默然。

使西太后“默然”的，是李鴻章的倔強。不僅如此，李鴻章還把自己與康有為作比較，深嘆“（吾）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并“在都中逢人輒語云：康有為吾不如也”。^②在戊戌年間的中國，這些話都是驚世駭俗之論，正因為如此，這些話又決不會是率意出口的一時之言。遠在康有為鼓吹變法之前，李鴻章已經在同一個題目下發過不少議論了。雖說此變法與彼變法是分開來的兩篇文章，但同一個題目下的兩篇文章畢竟容易觀摩比較，引發心得。因此，小變法論者李鴻章能夠比別人更多地欣賞和理解大變法論者康有為，并因之而產生同情。這種同情的力量有時候竟勝過詔書，使得“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鴻章一次一次地向這些海外逃客們送去“惓惓之意”。梁啟超在這個時候寫回來的一封信中恭敬地說：

去國以來，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領事鄭君、東亞同文會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問之言，并教以精研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等語，私心感激，誠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舊，于萬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問，至再至三，非必有私愛于啟超也。毋亦發于愛才之盛心，以為孺子可教，而如此國運，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沒世

耶。^⑨

字裏行間集注着一汪強烈的知遇感。身在海國，時處逆境，這種知遇會觸發百感交集，并使人終身難忘。所以，梁啟超後來“爲李文忠作傳，篇中着眼處，即寫其所以文，所以忠”。“蓋深服文忠之爲人，其于文忠生平辦事不得已之苦衷，皆洞若觀火”。^⑩由此裡露出來的同情，又表現了歷經患難之後的下一代維新變法人物對上一代自強變法人物在精神上的理解。與梁啟超相類的，還有新黨的另一個幸存者張元濟。他在政潮起落中被革職并“永不叙用”，一夜之間喪失了官職，也喪失了事業。而落寞之中向他援手的也是李鴻章。時過半個多世紀，他追敘舊事，仍然不能忘情：“我平素與李鴻章沒有什麼淵源，祇是長官或（與）下屬的關係而已，但他對我似乎是另眼相看。”^⑪人世間很多悲歡都會成爲過眼烟雲。相比之下，能夠積留在記憶裏的東西總是經得起歲月磨洗的。

李鴻章對這些人“另眼相看”，並不是因爲他完全贊成維新派的主張。當維新思潮聲光四播的時候，康有爲曾極富自信地上書皇帝說：“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衆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圖霸定矣。”^⑫在相近的時間裏，李鴻章有過一次“歷聘歐美”之行，一路留下許多言論。其中在英國的一場講演正非常明白地表達了他與新黨少年們在同一個問題上的歧見：

吁嗟乎！以華人生齒之繁，求其一世中（三十年爲一世）于變時雍，與西方相伯仲，天下縱有笨伯，亦斷不敢謂今日言之，明日成之也。而况矯柔造作，使其強就此途也？擎